

目 录

回忆长辛店救国十人团各界联合会.....	盛 成 (1)
长辛店的八月罢工和二七罢工.....	王占斌 (3)
游卢沟桥, 忆京兆师范.....	孙敬修 (5)
从宛平简师到北京十二中.....	张裕泰、卜琦华 (7)
长辛店工商业联合会.....	刘秉德 (10)
北京市解放前国药业概况.....	张润生 (14)
北京市硬木家具业事略.....	吴国洋 (17)
北京泥人张今昔.....	吴国洋 (21)
大葆台西汉墓的发现和研究.....	韩 锐 (24)
五显财神庙琐谈.....	刘仲孝 (27)
花神和花神庙.....	韩 锐 (29)
永定河河兵.....	邢锦棠 (31)
瑞轩花厂的鲜药生产.....	张 霖 (34)
丰台遗址今何在.....	刘仲孝 (35)
长辛店地名考.....	邢锦棠 (37)
国民党宛平县训练所.....	巴松坡 (39)
长辛店成立工党.....	吴太伯 (40)
长辛店机厂的建立.....	吴太伯、郭若楷 (41)

回忆长辛店救国十人团各界联合会

盛 成

编者按：

盛成同志今年已近九十高龄，是北京语言学院教授。早在1919年他就勇敢地投身于“五·四”爱国运动，曾亲身经历了火烧赵家楼的场面，是“长辛店铁路工人救国十人团”的发起者，在运动中与周恩来和许德珩等人结识，并从此建立了革命情谊。后于1920年去法国勤工俭学，并参加法国共产党，同时被推举为法国南方地区兰恩道克的省委书记。他用法文创作的传记体长篇小说《我的母亲》风靡法国、西欧和拉美二十多个国家。他与戴高乐将军、毕加索、居里夫人、罗曼·罗兰、爱因斯坦、海明威、保罗·瓦莱里等世界名人建立了友谊，美国人办的《密勒氏评论报》先后两次把他的名字列入《世界名人录》中，除《我的母亲》之外，他还创作了续集——《我的母亲和我》以及诗集《秋心美人》，《狂年吼》和论著《但丁》，《论语北辰考》等，还应联合国之请把《老残游记》译成了法文；把巴尔扎克的小说《乡村传教士》和瓦莱里的诗集《海上坟园》译成了中文。由于他蜚声海外文坛，在西方拥有许多崇拜者和研究者，这些人专门组织了一个“盛成文艺之家”，每逢星期六活动一次，他在侨居法国期间，每次都应邀在活动中主讲各种与会者感兴趣的题目或回答他们的提问。他于1978年底回到祖国大陆定居后，“盛成文艺之家”仍照常活动。直到目前，他还时常寄去一些诗歌和信箋，供“盛成文艺之家”的成员们欣赏、阅读。

1983年5月1日，应邀来华访问的法国总统密特朗在一次演讲中热情地回顾了法中两国

传统的友好感情之后感慨地说：“盛成与我国的大作家，被称为‘当代雨果’的保罗·瓦莱里是亲密的朋友，这使我们感到骄傲……”1985年3月14日，这位总统指示他的驻中国大使夏尔·马乐以他的名义把一枚金光闪闪的“荣誉军团骑士”勋章戴在他的胸前，在祝词中盛赞：“您积极参与我国文学生活，使您成为我国作家之一。您作为唯一使用法语创作的中国作家，半个世纪以来，您对我们的语言表达了热爱之情。”

盛成同志是长辛店早期工人运动重要的发起者、组织者，并为此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他从法国回国定居以后，还多次到长辛店二七机车厂参观、指导，发表重要讲话，给广大工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回忆长辛店救国十人团各界联合会》一文，是他的回忆录。1978年12月27日，长辛店二七纪念馆吴太伯同志访问他以后整理而成。

回忆长辛店救国十人团各界联合会

我是1917年到的长辛店，1919年10月，以长辛店十人团代表的名义，参加上海全国各界联合会离开长辛店，到上海和施洋在一起。1919年11月8号，坐英国的轮船同王若飞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

留法预备班就是法文专修馆。在今长辛店铁路中学内。长辛店留法预备班的班长罗喜闻和我很熟。1918年冬毛泽东来到长辛店，我没有在，没见到，事后罗喜闻告诉我的。

原来铁路上有个工党，是民国元年由李石曾、江精卫、吴雅晖成立的，总部在北京西河

沿，没有什么进步意义，他们反对袁世凯，袁世凯就在铁路上发了一批来复枪，来对付国民党。上边是段祺瑞的势力，由陆军部发下来的，由当时铁路执政曹掌管。

我们准备发动五四罢工，陶善琮、李茂银等，就把这些枪给拿出来了。

长辛店是五月六日成立的救国十人团。这时李实就开始来长辛店。

当时长辛店有工界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有商界救国十人团联合会，有学界救国十人团联合会，还有女界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工界救国十人团，是由车务见习所、艺员养成所、留法预备班、机务和大厂组成的。车务见习所是由我和吴宗祥组织，艺员养成所由陶善琮、武明科、张珍组织，机务由郭长泰组织，大厂由史文彬、陈励懋、李茂银组织，学界由孙正芳、王显中组织，商界由欧阳启华和孙正芳组织，女界代表是须永德的爱人许宝英组织。以工界的十人团为核心，联合起来就是各界联合会。当时我是各界联合会的会长，也是十人团的团长。我离开长辛店以后，由孙正芳担任会长。十人团和各界联合会就在娘娘宫办公，有一个宣传组，一个交际组，约在1919年六、七月份成立的各界联合会。

五四以后，我们还联合办了一个民众识字班。因为大厂里的工人有很多不识字的，我们可以在识字班里向工人农民宣传反对二十一条，抵制日货，反对卖国政府等救国道理。反动派也不敢干涉我们。我们画了一个表，分配谁在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去（指车务见习所、艺员养成所、留法预备班）宣传。长辛店大街娘娘宫的北屋，是工人识字班夜晚上学的地方。我们还经常轮流带着小黑板到琉璃河，卢沟桥等地方和长辛店附近的农村里、给农民办识字班，向农民宣传反帝爱国的道理，还代卖无敌牌牙粉。

我们还成立过新剧团，在娘娘宫演过《火烧赵家楼》，这出戏的剧本，好象是从北京抄来的，改了一下，由须永德演曹汝霖，有一个

姓王的男学生演曹汝霖的小老婆苏佩秋，张珍演曹汝霖的老太太。我和高凤藻、郭维海演学生，痛打曹汝霖。演出时，在娘娘宫院里临时搭了一个大台子，看戏的人很多，把娘娘宫的大门都挤坏了……。那时还搞过几次提灯会，有一次我们提灯到了卢沟桥。

“六·三”运动前，李实和张国焘来到长辛店要求长辛店派代表参加请愿，一定要找一个真正的工人代表，当时长辛店选的是翻砂场工人张珍，知识界武明科，还有学界郭维海，是以长辛店各界联合会代表的名义参加请愿的。6月2日晚代表去北京的。天津的代表有周恩来、马骏、郭隆真、刘青杨、邓颖超、巴文俊等也来到北京。湖北的代表有施洋。请愿时分几批人去，第一批被挡回来又去一批，最后代表被捕了，还有一段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的故事，但实际上这次周恩来没有被捕，张愚、武尚、郭隆真、施洋被捕了。“六·三”运动是天津学生发动的。

“六·三”以后，张国焘又来到长辛店向我说，要求长辛店工人罢工，我说：罢工要钱维持工人的生活。他说：天津万德成存了三万元银洋，是罚卖日货商人的款，你到天津去要。我到了天津，见到周恩来、马骏、邓颖超等。他们答应给我一万元现洋，作为长辛店铁路工人罢工的经费，钱我没有带回来。六月二十四日我回来以后，就准备罢工。这时，由于全国爱国运动的蓬勃发展，北洋军阀政府被迫释放了被捕的学生，罢免了曹、章、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当天晚上北京报纸就出来一个号外，公布罢免曹汝霖、陆宗輿、章宗祥的消息。因此，罢免曹、章、陆的目的达到了，长辛店的工人才没有罢工。

周恩来、张家俊、巴文俊到法国去勤工俭学的旅费，就是从这笔罚卖日货的款中提取的。

长辛店各界联合会派了三个代表：有我、高凤藻和郭维海，到上海参加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当时湖北的代表是施洋、天津的代

长辛店的八月罢工和“二七”罢工

王占斌

我是长辛店的一个老工人，亲自参加过1922年8月(24—26日)第一次罢工，和1923年2月(4—7日)的二七大罢工。现在我把长辛店罢工斗争的情况简略回忆如下。

那时候，工人生活是非常困苦的，一般的工匠，每日工资才四五毛钱……。但最坏的是受工头总管的压迫，上班不能晚去一分钟，去晚了不是罚工就是罚钱，所以工人非常害怕工头总管，但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忍气吞声。

在当时工人又分为长牌和短牌，长牌是正式工人，短牌是临时工人，一些短牌工人在铁路上干了好几年，也不给改长牌，不能享受铁路待遇，每月干包活只给六块钱。

当时吴佩孚正和张作霖打仗，他为了买好工人，好给他拉军运打仗，就实行了所谓“劳工政策”。另一方面又派了他的走狗赵继贤当京汉铁路局局长，勾结各部门的工头总管来监督工人。因之，所谓的“劳工政策”就是加重工人的负担。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是没有出路的。但幸运的是就在这时我们有了共产党的领导。1920

年北京共产党组织成立后，李大钊就派邓中夏等同志来长辛店，着手帮助工人组织工会，以维护工人的切身利益。但是，当时军阀是不让工人成立工会的，只好以办学的方式先成立劳动补习学校，才得到了批准，白天是工人子弟上学，我当时就在这上学，晚上是工人上学、娱乐、开会、讨论问题。就这样我们工人有了组织。

学校的教员都是进步的知识分子，其中就有共产党员，明着是学校的教员，实际是党代表，在学校里宣传马列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理论。学校的组织是委员议事制，采用工会的组织形式，以吸收学员发展组织，一九二一年五月，就正式成立了工会，会员够十个人编成一组，名为十人团，每组选出一个干事，名为十人干事，在每个部门选出一个总干事，由总干事中选出七个委员及一个会长，来办理工会事务，开展活动，把工人逐渐地组织起来，工人也才真正有了自己的领导机构。工会在教育工人提高文化知识的同时，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到了这年的十月，为了便于发展会员把

表是马千里(他是天津教育救国联合会的主持人)马骏、刘青杨等。十一月间，孙中山先生还派了黄大伟代表出席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在会上发表演说。

各地代表在上海交流了经验，更多的了解了苏联十月革命的情况。对于长辛店的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对于以后，1922年的“八月罢工”和1923年的“二七罢工”都有很

大的影响。

因此，我认为，全国工人运动的发源地是长辛店，革命的摇篮在这里，南段是施洋负责。北段是郭维海，他死后是史文彬负责。

二七纪念馆

吴太伯整理1978年12月27日

工会改名为工人俱乐部，领导工人结合切身利益组织斗争，向路局提出了，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的条件，但路局没有答复。没别的法子就召集工人准备罢工，正式向路局提出罢工条件：一、开除火车房总管郭福祥。二、俱乐部有推荐工人权。三、同路工人每月增加工资三块。四、短牌工改长牌工。五、给乘务人员盖休息室。六、因工受伤不扣工钱。七、参加直奉战争的司机、生火等乘务人员，应加薪一级。八、司机的最高工资，应做工多少年才能得到，请路局说明。九、长辛店工人太多，应盖官房给工人住。把条件再一次送到铁路局，并限期要二十四小时内答复，同时也进行了罢工准备，组织了纠察队。二十四小时过了，路局还没有答复。1922年8月24日，就开始了第一次罢工，为了防止有人破坏，纠察队在工厂、车站及各重要的地方站岗。路局派来军队准备用武力来镇压。可是工人已经有了强壮的组织及充分的准备，并有纠察队保护。局长赵继贤没办法，用电话叫工人派代表到路局去谈判，结果工人这次罢工三天取得了胜利，路局答应了工人提出的全部条件，但最重大的胜利是路局承认了我们的工会。

二七大罢工

由于第一次罢工取得了胜利，工人的情绪大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决定组织统一，把工人俱乐部又改成了工会。这时全路共成立了十六个分会，工会的威信提高了，工人的地位也提高了，形势发展急需统一起来成立总工会。1923年1月5日，在郑州召开了第三次总工会筹备会议，决定在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并把这事呈报了路局和吴佩孚，也得到他们的批准，除通知各分会外，还发了请帖邀请各路代表参加。

到了1月28日，开会的代表和各路的来宾都陆续来到郑州，这时吴佩孚突然下令不让工人开会，经工人派代表交涉无效，代表回来一传达，大家都很气愤，我们准备了半年，也得

到局长批准，为什么突然决定不让我们开会，现在会期已近万难更改，各代表一致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要按期开会。

2月1日早晨，代表来宾集合整队出发，奔赴善乐园会场，冲过军警的戒严阻挡，终于到达了会场，立即宣布开会，随后警察局长黄殿辰闯进了会场，严厉制止开会，大会无法进行下去，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万岁”的口号声中，草草散了会。

可恶的警察局长黄殿辰（吴佩孚的狗腿子）下令不叫饭馆卖饭给工人代表吃，旅馆不叫工人代表住，代表行动有人跟踪，谈话有人干涉。在这样恶劣情况下，全体代表又聚在一起，在一个工人家里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进行全路大罢工，各代表来宾迅速离开郑州，回去等待总工会下达罢工命令，总工会迁到江岸去办公，各分会一切听从总工会的指挥。

第二次罢工，是1923年2月4日开始的，这次是由北京至汉口一律罢工，发表了罢工宣言，提出罢工要求条件：（一）撤职查办局长赵继贤，南段副局长冯云、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二）要求赔偿召开成立大会所受的一切损失，被破坏的匾额重新挂起，被抢走的礼物，要求郑州军警奏乐送回。（三）每星期休息一天，阴历年放假七天一律不扣工资等条件。当天长辛店也进行了罢工，纠察队布满了工厂、车站及街口，并准备了三个吹号的，遇事吹号集合，组织了调查团防止奸细破坏。第二天（5日），由南边就开来了队伍。全路都罢工了是谁开的车呢？原来是交通系的走狗给开的车，调军队来长辛店镇压工人，同时赵继贤还派人从唐沽造船厂招来一百多名工人，进厂搞假开工破坏罢工。六号又派来了军队，把长辛店包围起来，到处布满了岗哨，限制工人活动，同时也派来了代表劝工人上工，这就是一方面用硬的，一方面用软的，工人不信这一套，不答应我们的条件我们就不上工。于是六号夜里在工贼的带领下军警挨门逮捕了史文

（下转第7页）

游卢沟桥、忆京兆师范

孙敬修

人一上了年纪，就滋长怀旧情绪，我今年八十五了，常思念小时候同母亲住在卢沟桥时的情景；怀念教育我成长的“京兆师范”；再加上这里有我的亲戚和学生，总想重游卢沟桥。

今年入秋，我就让孩子们操持。终于在过了中秋节不久，带着儿子全来、儿媳金秀，孙女、外孙媳、重孙等，四代同车冒着细雨，驶向卢沟桥。

我先到儿媳金秀娘家，她的家人热情接待。然后又驱车到张霖家，他是我五十年代的学生，留我们吃了一顿美餐，饭后，他陪我们重游故地。

车停在石桥东头，为了保护这座古老的文物，国家在1985年宣布，石桥退役，不再通行畜力车及汽车，只供游人参观。下车后张霖问我：“老师，您能走过桥去吗？”我抬脚让他们看了看我穿的一双旧布鞋，说：“你瞧，我早为步行做好准备啦！”他笑了。

一抬眼，就看到“卢沟晓月”碑亭了，这是我最想看的了。秀美的碑文，比当年还显精神；看来碑亭好像重新修过，周围打扫得很干净，堤坡上种有松树，使这里更吸引游人了。当年在京兆师范上学，偶有余暇，同学三五结伴，从桥西信步走到这里，对着碑亭也曾遐想过未来自己的事业。如今，我已走过漫长的道路，想在碑亭前边留个纪念。孩子们立刻围拢上来，咔嚓一声，留下了珍贵的影象。这时，有游人向我打招呼：“您是孙老师吧！您好！”我很高兴。有个少先队员向我敬礼说：“孙爷爷，您好！您在电视里讲的故事我真爱听！”我说：“谢谢！祝你好好学习！”孩子说：

“听孙爷爷的话！”从在京兆师范学习时，我就想给孩子们更多的精神食粮，今天见到的游人，以及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不是很能说明我给他们精神食粮是理所应该的嘛！

我拄着手杖向桥西走。当年在京兆师范上学时，桥面上的景物又浮在眼前，骆驼脖子上的大铁铃铛，发出有节奏的“哐啷！哐啷”的声音，令人感到沉闷；衣衫破烂的行人，忙忙碌碌的在桥面上奔来奔去，畜力大车，把桥面轧成深深的车辙，走动起来那样费劲。特别是每到山洪泛滥，桥下的洪水夹带大量泥沙，像发疯的野兽，想把石桥吞没，桥洞被洪水挤满了，不时漂来被洪水夺去生命的尸体，整个河床，带给人们恐怖的情势。一些人，看到河里冲来房椽瓦砾的木料，就一跃漂下，有的却因此一去而不复返了。学生时代的这些所见所闻，难以从记忆中忘掉。

步行到桥西头，一眼就看到了“岱王庙”，这就是我原来读书的“京兆师范”地址。当初庙前有两棵榆槐，紧靠门两侧，经过几十年的岁月，如今只剩一棵了。原来有一块匾额，上有“岱王庙”三个大字，是用汉白玉石刻的，镶在圆拱式的石门上边。这座庙是三进院。一进三间正殿，两层楼，山门一般不开，改为学校后，索性把门洞改为储藏室了。从侧门进入，东西两排厢房，是学生宿舍及其它用房，正中是二进大殿三间，最后一进也是三间，里面的泥塑佛像，没有毁坏，只是用纸糊成的板壁挡了起来，算是两个不小的教室。当初的模样，今天变的怎样呢？我们进去一看，面目全非了。整个院落被一间间小房子挤得几乎没有

走道的地方。殿前竖立的石碑也被推倒在地。

想当初，这里是为京兆二十个县培育教师的学府！经费不足，校舍不够，只有两个教室，不能每年都招生，必须送走一班，再招一班才成。直到“五·四”运动以后，京兆师范才从卢沟桥迁到通县西门里路北新校址，并且在通州塔附近，设立了京兆师范女部，教师在两部都任课，为北京地方培育教师，发展教育事业，做出很大贡献。

学校未迁时，在卢沟桥只有两个教室，两个班，每班学生40人，由于经费不足，一切设备都很简陋。课程有物理、化学，却没有试验室，只靠课堂教学。有一架显微镜还不许学生动手。音乐课只有一架不大的风琴。体育课根本没有什么器械，踢足球就到河滩里去，没有球门，堆上两堆石块代替，足球破了以后，找缝鞋匠补上皮子，而且还不止补一次。跳高没有架子，用两根木棍钉上钉子再架一根长竹竿就算完成了。学校的设备虽然简陋，但老师在教学上非常认真，不管白天黑夜，不放过一刻可以督导的机会。校长姓尚，还有一位学监姓萧，学校简直就是他们的家了，对学生也看成是自己的子侄，教学上一点儿都不放松，对学生的生活也十分关心。两班学生，根本没有逃学的。

怀着对往事的深沉回忆，走出庙门，站在古槐树下，无限留恋的拍了一张照片。

记得紧靠学校东边直到桥头，有一排北房，称为“税局子”，是过往客商的一道关口。当时有首民谣：“卢沟桥，卢沟桥，雁过都要拔根毛”。税局子大概在一九一六年撤销了。

正在回忆的时候，有人喊我：“孙老师，今天可见到您了！”经过谈话，才知道他是当

年京兆师范工友老王的小儿子，他小时候，有鼻子出血的病，他两个哥哥都是患这种病死的。是我母亲找的偏方治好了他的病，他现在都六十开外的人了。当年是近街坊，他的家和我母亲住的福音堂只隔一堵墙。我问他：“福音堂的院子还有吗？”他说：“有”。我记得，福音堂的院子就在公路南很近，及至到那儿一看，已不是原来的样子了。我对儿子、儿媳说：“我和你奶奶在这里住了三年多，那时你奶奶在这儿工作，每年寒暑假，我都来同你奶奶住在一起。

在往桥东回走时，还见到我的同学巴小泉的弟弟，我已不记得他了，他说：“我听您讲过《儿童心理》。”这我才想起，五四运动以后，发展教育事业已成为有识之士的立足点，宛平县也有一些原来的同学，办起师资训练班，对小学教师利用寒暑假进行培训。那时我在北京汇文小学任教，老同学为发展教育事业，要我来讲课，我当然心甘情愿的骑着破车，从城里走四十多里来和青年们交流教学方法。他说的绘声绘色：“您那天到了讲堂，学员乱哄哄的，您什么都没说，在桌前一坐，把帽檐往下一拉，学生一看，都愣了，也不言语了。这时您站起来说：“这就叫儿童心理……”他说的我也笑了。

一个接一个回忆，没无边际的追思，在蒙蒙的细雨中，我感到是那样滋润。陪同我来的晚辈，他们怕我着凉和累着劝我早些回去，他们哪里知道，我内心正把苦难的过去和幸福的今天，溶进无边的追思里。

（孙全来、张霖整理）

1985年9月

注：京兆地方辖县：大兴、宛平、良乡、固安、永清、安次、三河、蓟县、涿县、薊县、昌平、武清、宝坻、顺义、密云、怀柔、房山、平谷、香河共二十县。

从宛平简师到北京十二中

张裕泰、卜琦华

北京十二中，其前身是中华民国时期的河北省宛平县简易师范学校。简师于1934年建立，日本侵略中国时受到严重破坏，被迫解散。1945年日本投降后，于次年复校。1948年12月14日丰台解放后，在较短的时期内，简师得到较大发展。1948年4、5月份，大兴县简师并入我校。1950年12月29日，根据上级的授权，接管了一所半工半读教会学校——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华北三育研究社。1951年7月改为北京市第十二中学。

宛平简师的建立

宛平县原有一所京兆师范学校，该校后来迁往通州。随着乡村教育的发展，宛平县感到缺乏小学教师。教育科为解决这一困难，不定期地办了几期讲习所，培养小学师资。在此基础上，1934年建立了河北省宛平县立乡村简易

师范学校，不久正式命名为河北省宛平县立简易师范学校。校址在宛平城西门外卢沟桥南约二百米处永定河东岸龙王庙内（今肉联厂）。这是一座庄严优美的古式庙堂建筑。据“日下旧闻考”所载，该庙建于明正统年间，清康熙三十七年重修，乾隆十六年、三十九年又两次重修。传说乾隆皇帝视察卢沟桥时曾在此休息，坐在西斋房内观看永定河。龙王庙的前殿及其附属建筑被宛平县教育科占用，后殿及其附属建筑被简师占用。简师学制四年，相当于初中毕业程度。第一任校长由县教育科长崔以钧兼任。教职员共四人。第一届预定招生50名，未能招满，实收学生42名。全年经费二千六百零四元。对于成绩优秀的学生，学校给予代付每月伙食费的奖励。宛平简师有附属小学一所，校址在县城内，教职员5人，学生147人，全年经费一千八百九十六元。

（上接第4页）

彬、陈励懋、洪永福等十二名工会主要领导人。七号工人知道后，更加义愤填膺，没被捕的工会骨干组织工人，由纠察队带领到火神庙（警察局所在地）去交涉，想要回被捕的工人。结果军警开枪了，当场打死葛树贵、杨诗田、辛可红三人，受伤者十一人，一时工人队伍大乱，敌人又调来了骑兵向工人队伍横冲直闯，把工人冲散，工会被军警占领，由天津塘沽招来的工人，在军警的掩护下也进了工厂，这时工人心中虽然充满了对军阀的愤恨，但罢工被破坏了，领袖被捕了，结果失败了。

不仅长辛店为此，京汉路各厂站段都是如

此，北方其它各铁路也不同程度地受到镇压，一时全国的工人运动转入了低潮，这是一件使我们永远忘不了的痛心的事情。

二七事件彻底揭穿了吴佩孚“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从此，他失去了工人的援助。二七后仅一年多的时间，冯玉祥倒戈，吴佩孚在京汉路的统治土崩瓦解了。后来被北伐军彻底消灭了。

二七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他培育了革命的力量，在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们在共产党和英明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战胜了国内外的敌人，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吴太伯整理）

1937年7月，正当简师第一届学生将欲升入四年级之际，发生了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略中国的卢沟桥事变。宛平简师的校舍遭到日本侵略军炮火的轰击，破坏严重。学校正处在战场附近，不能开学上课，暑假中遂告解散。在以后的八年抗日战争中，家住在宛平县八区（门头沟以西清水、斋堂一带）的简师学生，有一部分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最著名的有八个人，被当时简师的校友亲热地称为“八大山人”，可惜已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宛平简师于1946年复校，迁至丰台镇东安街（现今十二中校址）。该处原是日本侵略军的练兵场，后改为日本居留民团国民小学。学校中部有一座地基呈曲尺形的平房，分为十间教室。教室的南边有一座木板棚是食堂。学校的全部建筑仅此而已。复校时简师的校长为张子箴。复校当年招一个简师班，35人（其中有三名日本学生，三名女学生），学制三年，相当于初中程度。另外招一个师资训练班，32人，学制一年。1947年学校招两个简师班，72人。1948年招两个简师班，60人。简师的学生享受公费，由政府供给伙食，每周五天粗粮，一顿白面。

简师复校后，附属小学也得到恢复。在简师校内南侧新建排房一座，作为附小教室，有两个班学生，三名教职员。

解放以后的发展

1948年12月14日丰台解放。1949年1月丰台军管会派郑伯平同志在简师召集全区教师办学习班，宣传党的政策，布置各校复校开学。简师部分师生响应党和人民政府的号召，组织复课委员会，开始复课，师生互相转告，络绎不绝。2月，军管会宣布郑伯平担任简师校长。复课委员会遂告结束。3、4月份北京军管会西南分会先后派任寄、杨小如等同志组成工作组进校、加强领导。

4、5月份，大兴简师一年级学生一个班

约二十人并入我校。大兴简师校址在大红门。解放军围城时，该校驻满国民党兵，把校舍糟踏得不成样子。1948年11月，该校校长宣布学校解散，限学生一小时内离校。北京刚解放时大兴的军管会派人接管该校，校内空无一人，一切物品荡然无存，房屋严重破坏，难以恢复。不久大兴和丰台的军管会合并为西南分会，因而大兴简师并入了我校。

解放之初，简师教职员中，国民党员不少，学生中，三青团员也比较多，思想复杂，所以改造旧学校的任务十分艰巨。军管会、工作组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

一是开设政治课，请负责同志讲课，向师生进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教育和政策、形势教育。当时曾在简师讲过政治课的有冷林同志、柴泽民同志（当时任北京市军管会西南分会副主任，主持分会工作）等。柴泽民同志于1949年5月4日结束课程后还和全校师生合影留念。

二是在学生中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组织。先开展青年工作，团结教育进步青年，随后在1949年暑假（7月中旬至8月中旬），选送10名进步青年参加北京市大中学生暑假学习团学习，地点在东城灯市口，男生住育英中学，女生住贝满中学。在学习班结束时，10名同学都加入了团组织。1949年9月简师正式建立团支部。第一任团支部书记为梁树勋，学校团支部受丰台区团工委和学校工作组双重领导。很快各班都陆续发展了一批团员。当时团支部很活跃，结合政治任务，几乎每天有活动，把学生的思想工作全包了。

三是组织师生参加一系列政治活动。如刚解放不久，就动员部分师生参加南下工作团；与解放军联欢，我校合唱团演出四部混声合唱《游击队员之歌》；组织部分学生到美国人主办的教会学校“三育研究社”宣传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1949年暑假组织学生成立剧团，演出秧歌剧《兄妹开荒》及歌剧《王秀鸾》，由战车文工团乐队伴奏，主要到医院演出儿

场，慰问解放军伤病员，情绪相当热烈，当时北京青年报曾报导此事，题为《大家选演员，演出王秀鸾》；1949年10月1日，郑伯平校长带领全校师生，早晨5点多钟与郊区农民、工人同乘一列火车去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通过一系列活动，使师生在实践中受到教育，提高觉悟。

这一阶段，学校领导在团结进步师生、改造旧学校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但也有失误，如部分学生与校领导产生了对立情绪，突出地表现在对助学金使用上的意见分歧，这种情绪逐渐发展，最后部分学生到市教育局反映对校领导的意见。市局派中教科杨滨同志来校调查解决问题，决定撤掉郑伯平校长职务，派王岑伯任新校长，又取消工作组，任命杨小如为教导主任，任寄为政治教员（不久回军管会）。从1949年11月起简师归市局领导，命名为北京市立简师师范学校。

1950年夏，简师毕业生有三十多人到沈阳从事小学教育工作，有二十多人到石家庄从事小学教育工作。由于北京市解放不久，小学教育发展还不够快，小教师需要量不大，尤其是初师毕业生不能都安置，所以这些毕业生由郑孝侯校长介绍到外地工作，其余毕业生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或走上其他工作岗位。

解放后，简师附小也于1949年2月复课。附小有教师4人（主任屈舒平），学生一百多人，分四个班：一年级和二年级合用一个教室，实行二部制，三、四年级组成一个复式班，五、六年级组成一个复式班，以适应简师学生实习的需要。

简师改成十二中以后，在校外平安胡同购买新校舍一处，1951寒假后，简师附小迁入新址，与丰台镇第九中心小学合并，就是现在的丰台镇第五小学校。

1950年12月29日，政务院公布了《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根据此项决定于1951年春上级授权北京简师接管“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华北三育研

究社。”该社成立于1934年，由美国教会主办，是一所半工半读的教会学校，带有孤儿院性质。校园占地一百亩，社内设有纺织厂，生产纱布、卫生巾等产品，供协和医院使用。该社对师生思想控制极严，不准他们和外校师生接触，解放后我校曾派学生进入该社联系，未能成功。甚至三育社的学生在西道口游泳被淹，救上来以后我校学生要给他做人工呼吸也不被允许，终于死去。抗美援朝开始时，各单位爱国热情高涨，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而三育社却不参加，激起社会各界极大不满。接收后师生去留自愿，只有一位化学教师自愿留下继续工作。

由于当时北京市小学教师需求量不大，1951年7月简师改名为“北京市第十二中学”，因而课程、教员也作了相应的调整。

在抗美援朝高潮中社会上捐献飞机大炮，十二中师生也积极参加社会上的政治活动。1951年1月8日全校两批学生共30人参加军训。1951年建立团总支，发展学生团员，1951年10月进行了中小学教师思想改造运动，1952年1月参加了三反五反运动，52年5月组织了纪念“五四”青年节活动（展出参军同志的照片、学习成绩、事迹、立功大红花），52年冬忠诚老实运动（郊区教师集中在贝满中学，交代个人历史），53年1月全校学生写信慰问志愿军，53年3月部分学生去天安门参加斯大林同志追悼会等。

解放后十二中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得到长足发展。1949年4月正式上课时，全校只三个班，三年级一个班，二年级一个班（1947年招了两个班，解放后合并为一个大班），一年级一个班，到1953年就发展到24个班。经过历次运动的教育，教师的思想得到改造。历年派进大学毕业生，使教师队伍得到更新、扩充。行政领导逐步健全。经过这一阶段的工作，旧学校逐渐改造成为新学校，在丰台区解放初期一系列的重大政治运动中发挥了较大的宣传作用。在教育方面，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

长辛店工商业联合会

刘秉德

长辛店工商业联合会，成立于1950年。是解放后郊区成立工商联较早的一个。它的历史虽然只有六个年头，但它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

长辛店工商业联合会的前身是旧宛平县商会。解放后，旧商会虽然做了些工作，但由于它不能适应新形势，因此，成立新组织势在必行。

长辛店有悠久的历史。人称五里长街，两旁店铺林立，商业繁盛，经济发达。当时有座商（指有门面的）约500多户，其中大中商号占半数以上，经济实力雄厚，还有些具有经营特色的店铺：如隆泰和的糕点，庆和诚的玉米面，聚来勇的黄酱，在群众中享有盛誉。但是经过日伪八年摧残，国民党三年搜刮，百业萧条，民生凋敝，到解放前夕，有的商店已经奄奄一息。解放后，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重要课题是如何引导这些企业起死回生，提高他们经营的

积极性，为恢复国民经济发挥作用。

1949年6、7月间，根据区政府决定，在工商科领导下成立了工商联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由赵辑五为主任，孔兴周为付主任。下设秘书、财务、传达等三个组，任务是改组旧宛平县商会，为成立工商联做筹备工作。解放前夕，座商只剩下450多户，摊商（指摆摊与肩挑贸易等）800多户（1951年由摊商联合会单独领导）。筹委会第一步先组织座商，按照不同行业分别组成了19个同业小组。有粮食，杂货、绸布、鞋帽、中西药、陶瓷、照像、理发、缝纫、黑白铁、工艺、饮食、旅店、牛羊肉、猪肉、青菜、修车、土产、煤炭等，每组推选组长副组长各一名，推动本行业的工作。后来这些人逐步成为工商联的骨干，对贯彻执行党和政府的各项政策，协助政府推动各项工作发挥了积极作用。

解放后，长辛店地区百废待兴，工商联拥有财力人力上的优势，所以政府把工商联当作治。

☆ ☆ ☆ ☆ ☆ ☆ ☆ ☆
主动性，强调政治思想教育为主，所以这一时期的毕业生政治素质好，工作能力强，许多人后来成为区、局各单位及各学校负责干部，有的当了劳模。由于大力组织师生参加生产劳动，形成了全校艰苦创业、勤工俭学的好传统。学生会设生产部，负责组织全校的生产劳动，在十五亩地内种植棉花、玉米、蔬菜贴补伙食。学生自管伙食，在每月六十斤小米的伙食标准中还有节余，给每人制作一套校服。解放初期师生一概睡地铺，后来才逐渐有了铺板、床。在劳动和政治运动中，师生关系融

这一阶段全校师生艰苦创业，为十二中以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形成的勤工俭学的良好风气，成了十二中的优良传统。随着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十二中不断前进。特别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十二中每年都攀登到一个新的高度，学校办得生气勃勃，取得了明显的成绩，成了北京市第一批办得好的重点中学，在丰台区、北京市以至全国都有一定影响。

一支依靠的力量。筹委会除领导会员积极响应政府的一切号召外，还组织会员积极参加地方的一切建设。例如整修长辛店九子河工程中，筹委会主任、副主任带头，发动会员、骨干前后参加劳动五六百人次。有些经理原来在店里很少参加劳动，但在这次挖河工程中，他们却光脚赤背地大干特干，按政府分配的地段，保质保量地完成了任务，受到镇政府的表扬。有一次长辛店一带发现了蝗虫，严重地危害了庄稼，政府号召各界紧急动员扑灭蝗虫。筹委会积极发动会员，连续三天，前后出动300多人次，消灭了虫害。

纳税，是工商业者的义务，但是有的商号因受旧社会的影响，总是千方百计逃避捐税。又因刚刚解放，纳税依据又不健全，税工干部的工作难度很大。根据税务所的建议，筹委会挑选一些行业组长和积极分子，组成了税务评议小组。协助税务所大力宣传人民税收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税务评议小组利用熟悉工商户情况，群众又信得过等有利条件，同税工干部一起对450多户应纳税户，逢季、按年进行评议。基本上作到了既保证国家税收，又使大家负担合理，受到税务部门的赞扬和工商业者的拥护。有些人还被评为市、区纳税积极分子。

长辛店的四月庙，已有多年的历史（农历四月初八至十一），地点在大街娘娘宫（现在长辛店第一小学）。解放前夕庙会一度停止，过去管理庙会是以娘娘宫老道为主，还有一些地摊土绅。这些人管理庙会不如说是吃庙会，向商贩敛了占地费大吃大喝，最后个人还得捞点好处。解放后，政府决定恢复庙会。改变过去的管理办法，在镇政府和工商科的领导下，以筹委会为主成立庙会管理委员会。目的是促进物资交流，繁荣经济。从张贴广告到庙会管理，都由筹委会骨干分子承担。他们放弃本企业的工作，连续四天活动在庙会上。发现问题及时研究解决，经费不足，用工商联会费弥补。连续几年，庙会办的很活跃。筹委会还鼓励工商业者积极配合街道，加强治安管理。一些积

极分子不畏惧反革命分子的恐吓，参加巡逻、站岗、放哨，并协助派出所成立了治安保卫委员会，筹委会还参加了义务消防和防汛大队。

1949年12月4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发行“胜利折实公债”。筹委会为了动员各商号积极认购，在工商科帮助下，召开了行业大会，选派宣传员，反复讲解认购公债的巨大意义，使会员们提高了认识。这次大会，区政府秘书李培山同志亲自到会，会员受到很大鼓舞。1951年1月5日公债正式发行时，筹委会超额完成认购任务。

1950年根据区政府的指示，正式成立了工商业联合会。成立大会是在长辛店人民礼堂（现影剧院）召开的，全体会员参加，大会由筹委会主持。区政府和镇政府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筹委会主任赵辑五报告了成立工商联的筹备经过，并宣告筹委会工作到此结束。工商科科长谭中和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他指出：“工商联现阶段的任务是：教育工商业者爱国守法；宣传贯彻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政策；在工人同志监督下，搞好生产经营；并代表工商业者的合法权益。”会上还通过筹委会推选的23名执行委员。其中合作社、人民银行、烟酒专卖处各一人。在第一次执委会上，选举赵辑五（大同公经理）为主任，孙秀峰（合作社主任），刘秉德（恒兴永副经理），刘俊歧（全聚德经理），李子厚（福生永经理），李景科（同义楼经理）等五人为副主任。并选举出由九人组成的常务委员会。下设秘书、宣教、财务三个组，正式定名为“长辛店工商业联合会”（简称工商联）。

工商联成立以后，组织会员学习“共同纲领”，进一步认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历史阶段，五种经济（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农业个体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并存的伟大意义，加深对政策的理解。从而使会员解除了顾虑，安心进行经营，有的商店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发展。如“信益久”经营鞋帽，解放前濒临倒闭。通过

学习，经营积极性大为提高，到1953年该号资产翻了两番。1954年国家发行经济建设公债时，一次就认购了7000元。

为了推动大中型企业改善经营管理，工商联成立了劳资协商会议。认真贯彻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精神，教育工商业者正确对待工人监督，克服过去独断专行的旧作风。遇事同工人协商，不仅有利于企业，对改变自己的旧观点也有一定的帮助。如大同公、恒兴永、聚来涌等较大的企业就是依靠工人，在重大问题上同工人商量，使企业从1950年以后始终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工商联劳资协商会，在工商科帮助下，同工会一起协商各商店出现的劳资矛盾。如德泰厚杂货店，当时劳资矛盾相当尖锐，影响了企业的发展。这一情况引起了领导的关注，当我们召开劳资协商会议时，吕连英政委亲自参加，听取意见。经过多次同工会协商，使问题得到解决，企业有了好转。

1950年12月，国家财委判定了私营企业重估财产，调整资本办法。由税务所、工商科、工商联组成领导小组。重估对象是大中型企业。方法是自估、自查，工人监督，税务所干部抽查，工商干部掌握进度，最后由领导小组审批。仅用了三个月就全部完成了任务。结果证明，这项工作不仅对国家有利，对企业也有很大好处。因为私营企业在旧社会，每逢结帐，总要打厚成（增加积累），加上解放前币值贬值，帐目不健全等因素，自己也弄不清企业状况。通过重估财产，劳资双方对企业的资本，盈亏及财产状况基本掌握了，给后来经营管理打下基础。为了巩固以上成果，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健全帐目。为此，工商联又举办了会计培训班，聘请了两名教师。每期三个月，学员50人左右。学员一般是企业的会计员，还有少数社会无业青年，共办了三期，约150人，为企业和社会造就了一批人才。

工商联还配合工商科，进行市场管理。当时会员当中仍有少数觉悟不高的人，未按政府规定经营，偷工减料，损害顾客利益等消极现

象时有发生。为此工商联把行业组长、骨干分子组织起来，与工商科干部一起对一些店铺不断进行认真检查。如每次检查早点铺时，在早晨五点钟以前就到工商联集合。分头下去和群众一起排队，买回油饼烧饼等食品，件件过秤，户户评比，发现问题，及时召开会议，对好的进行表扬，有问题的批评教育。

工商联在卫生局干部帮助下，还建立了卫生委员会，由一名副主任领导。在镇政府统一部署下，发动饭馆、醋酱园、食品店等重点行业，卫生委员会还配合街道干部进行大街及铺户门前环境卫生的管理和清扫，使大街和铺户的环境卫生保持整洁，订立了爱国卫生公约。不断进行检查评比。

1952年协助税务所推动大中型企业建帐，把原来毛笔直书的旧式帐，改为新式的簿记帐（新帐本名称）。还把450多户纳税户划分为三类，即查帐户、评议户、固定户，群众反映很好。

1951年6月，抗美援朝总会发出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军烈属的号召以后，工商联积极响应，采取多种方法进行宣传。领导人带头，深入大户做工作，按行业分配任务，有突出表现的及时在大街上贴海报表扬，群众情绪大为高涨，只用了一个星期就捐献人民币三亿多元（旧人民币），在郊区工商联当中名列前茅，丰台区区长李培山同志还在大会上进行了表彰。在拥军优属工作中，工商联给长辛店镇100多户烈军属发了优待证。凡是持优待证到私营商店买东西，一律按九折收费。工商联还动员450多户商店订了爱国公约。在抗美援朝运动中，会员们不仅从经济方面积极支援抗美援朝，而且政治气氛也相当活跃，从主任到组长组织起来，积极宣传，学唱歌曲。并学会了《志愿军战歌》、《反对武装日本》等歌曲，并利用会议的机会或业余时间一起唱。政府有关干部说：这些老头越活越年轻啦。还在长辛店镇党委王文远同志的大力支持下，组织400多名会员，由主任和委员带头，进行了

反美示威游行。通过宣传，群众认识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意义，增强了爱国主义精神。

1952年伟大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工商联组织学员学习政策，提高认识，启发多数工商业者交待了自己的问题。

1952年6月13日政务院发布“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对五反运动定案处理原则，核实定案工作的决定”以后，在450多户大小工商户中只有一户四类户（严重违法户）其余都定为一二三类户，党的实事求是的政策使工商业者深受感动。运动结束以后，工商联又动员会员积极退财补税。这场运动使工商业者受到了深刻地爱国守法教育。

1953年国家公布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号召工商业者积极经营，为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贡献力量。国家还对有困难的户给予贷款扶植，使私营工商业又获得了新生，经营积极性大为提高。过去想报歇业的也改变了主意，在五反运动中经营消极的企业，又重新振作起来，使经济形势出现了繁荣景象。

1952年8月，政务院公布了“工商业联合会组织通则”，根据政府和市工商联指示，改变工商联隶属关系，长辛店工商联改由北京市工商联领导。并于1952年10月召开了会员代表会议，会上由赵辑五主任作了关于长辛店工商联三年来的工作总结，通过了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的人选。这次大会区政府工商科长谭中和同志及市工商联秘书长孙孚凌同志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

1953年1月召开了执行委员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常务委员会和正副主任，赵辑五当选为主任，刘秉德、李子厚、刘茂祥、阎华斌为副主任，区委宣传部长申耀池同志参加了会议，并讲了话，会后同委员们一起合影留念。在这次会议上，还将长辛店工商联定名为“北京市工商业联合会会长辛店分会。”从此，分会的人事经费业务等关系由北京市工商联直接管理，政治活动仍由丰台区委领导，主任赵辑五

被选为北京市工商联常委。

这次改组把芦沟桥和摊商联合会也包括在内。芦沟桥当时有座摊商五六十户，以前它们单有组织，刘茂祥为主任，王占德为副主任，摊联阎华斌为主任，傅有信、温会为副主任。新分会成立，把三个组织合并，摊商联合会撤消，芦沟桥成为北京市工商联长辛店分会的办事处。

1952年底，党中央提出“国家过渡时期总路线”，“要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新的分会成立以后，用了很长一段时间，组织骨干和大中型企业的工商业者学了党中央的政策，使大家提高了认识，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

1954年分会配合工商科和合作社，把30多户裁缝铺组成了“缝纫合作社”，选举王秀山（工商联常委）为主任，领导全社发展生产，为其他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作出了示范。

1955年合作社走向高潮，分会协助工商科把其他手工业、小型商业和服务业摊商组成了合作社、合作商店或合作小组，到1955年10月基本实现了合作化。同年6月，实现了公私合营，为大型商业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树立了榜样。从十月开始又领导粮食、杂货、国药、照像、陶瓷等行业开展联营并店活动，把丰台长辛店两地的同行业合并到一起，在丰台成立了区店，把资金资产重新估价，人员统一调配，并把一些行业门市部作了调整。这项工作在区政府领导下和工人同志的支持下，到十一月底基本完成。

1956年1月1日，长辛店在北京市统一组织下，实现了全行业公私合营。在丰台镇组织会员（包括工人）举行了庆祝游行，家家门前挂起了欢迎公方代表进店的横标，工商业者同工人同志一起敲锣打鼓迎接公方代表。同年长辛店工商联随着企业性质的变化与丰台分会合并成立了“丰台区工商业联合会，”至此，长辛店工商业联合会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北京市解放前国药业概况

张润生

一、我的简要经历

我于1915年2月8日出生于河北省三河县一个农民家里。父亲只念过半年私塾，到壮年时曾投师学医，后半生以医为主。

由于父亲体会到没有文化的痛苦，因此对我的培养不惜卖掉宅基地供我念了九年私塾，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到经史子集都读完了。1931年春，又去三河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校学习新文化。入学的第一年，正是1931年“9.18”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我东北三省，1933年春又进军华北，我亲自目睹了侵略者灭绝人性地残酷迫害我同胞离乡背井，家破人亡。当时正值我毕业后无力再升学，受任家乡小学教员。

1939年初，我来北京庆颐堂药栈，改学中药行业，因经理张浚泉是我家叔，故从经营管理开始，认识商品，掌握地道，了解货源，熟悉行情，以及如何识别各类药材真伪优劣的方法。经过各个环节的实际工作，对企业管理，商品流通，有了初步认识。随着业务的深入，逐渐探索药行市场的动态，谨慎的试行发展批发业务，以期在同行业的竞争中，扩大业务势力范围。为此转入集中精力搞批发业务，放松药材加工工艺基础知识的学习，所以汤剂饮片，丸散膏丹的加工制造过程，只是一般性了解，但对珍贵的原料药材，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如何渡夏的保管方法，经过几年的实践，得到了较好的解决，收获还是很大的。

二、国药业的加工生产技术略谈

药材虽也称为商品，但不同于其他行业的

商品。药材必须确保标准合格的质量、数量才是救死扶伤的法宝，否则就无法成为向疾病数斗争的武器。药材行业的道德性很强，质量好坏，关系着人民生命的安全。至于如何确保合格的质量：一是识别真伪，二是储存保管期间的养护方法比较复杂，再就是药材的类别多。

(一) 药材的分类：

植物类：根、茎、叶、花、子、实、果皮、树皮、全草等。

动物类：肉、骨、血、皮、筋、器官等，还有昆虫、爬虫、鳞虫的僵尸，以及动物类生产的牛黄、麝香、猴枣、羚羊角、犀牛角、珍珠等。

矿物类：朱砂、水银、玛瑙等。

人工合成类：红粉、轻粉、小灵丹等。

以上四大类的原料药材一千多种，以及数百种不同剂型的中成药。由于所含的成分各异，受大自然气候变化的影响也就不同。有的成分稳定，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有的成分不稳定，影响就很大。为此必须认真探索品种成分各异，反映情况不同，试行分类防治的养护方法。

(二) 试定药材商品安全水分含量标准

动植物类药材，它本身含有相当水分，且有安全水分含量标准。如水分含量超过安全标准线，渡夏期间受大气温湿变化的影响，就会出现不同的状况，如霉烂变质虫蛀等，严重地破坏药材有效成分。或者含水量过低，其有效成分随着应有的安全水分含量挥发而消失，程度不同地也会影响疗效，甚至不可药用。

总之，药材商品和其他商品的保管方法一样，本身水分含量大小，对储存期间保证质量安全起主要作用，这是属内因，大气温湿度变化的影响属外因。如果内因条件好，外因虽不利，也不会出现破坏质量的现象。

经过几年安全渡夏的反复实践，终于摸索出不同类别、不同品种的安全水分含量。据分析，动物性药材，大部分品种的水含量可为百分之六或八；植物性药材，水含量可为百分之十或十二。

(三) 根据大气温湿度对药材质量的影响，应注意分类养护。

成分稳定的品种，在变化较大的季节里，本身不受季节影响，不出现异状，在较差的储存条件下也不会影响它的质量。如矿物类的品种，以及动物类的贝壳和角等。

成分不稳定的品种较多，有极易生虫类的，如党参白芷等，党参含糖成分较多，稍受气温影响就会生虫；白芷含淀粉成分较多，也易生虫。

三、解放前国药业经营情况

国药业的兴衰与当时形势密切相关。我现在还记得几个不同时期国药业的发展和经营情况。

国药业和其他行业一样，也有个集体组织，即“北京市国药业公会，”它座落在崇文区东兴隆街南官园口内。该会负责全行业的集体事宜，对内掌握各会员户的经营情况，收缴部分会费。对外接受摊派的公务和苛捐杂税以及配给的一些物资，按各家营业额多少名目分配，实则受益的多为强者，弱者几乎没有，而被摊派的捐税则居多。

<一>统一配分：

由公会统一组织，搞一致的中成药配分。囊括各种丸散膏丹，胶醴药露，以维护全行业的利益。

(二) 抗战时的国药业情况

抗战后，北京虽属敌占区内的城市，但运

输工具只能为战争服务。民需商品置之不顾，物资也明显短缺；况且和非战区的交通要道中断，对外交通运输只限敌占区内，为此北京市形成一块进出范围有限的死地，如四川、广西、云南、贵州等地的许多名贵药材，还有靠进口的药材、货源统被切断。市场上的一些主要品种，自然出现奇缺。当时的天成、天汇、益成、隆盛药行四家行店的外柜和驻店倒买倒卖的客商，以及东西南北四城的药店欲买欲卖的各方，出出入入，络绎不绝，争先恐后地抢购甩卖。

在商品奇缺，行情不稳，市场混乱的情况下，人心惶惶，生活困窘。敌人为了稳定统治，组织军警宪特，对市民商店强化治安，压制物价市场。人们时刻都要提防敌伪骚扰和寻衅闹事，否则轻之勒索钱财，重之抓人刑处。那时，每当夜晚，街上多是军警宪特。各门市生意萧条，有价无货，即是有价也拒售，待卖高价图暴利。这个局面直到日本帝国主义投降时止。

(三) 国药业在敌伪时期各家经营情况。

当时，北京市国药业主要是乐、刘、吴、王、柳五大家，各据实力，互相竞争。除乐家的同仁堂外，唯孙家的长春堂经理张子余头脑清楚，经营策略也高人一头。他避开同行之间的矛盾，独创太上牌避瘟散、无极丹，不但独霸北京市场，并在南方几省市和港澳地区畅销无阻，既赢得企业的迅速发展，又与其他家药店在业务上无任何矛盾。

(1) 乐是指的乐家老铺同仁堂，这在全国国药业有代表性，该店经营策略是以精选原料药材和珍贵品种，认真依法炮制，在历史中成方配内，选制名牌大路丸散膏丹，一丝不苟，实事求是，不但药味分量要求准确，并一丝不苟精工细作。因而保证了各种成品的药效应验，赢得病患者的信任。如此历代相传，巩固发展，独占中成药销售市场的首席。经营手段以门市销售为主，函售为辅，汤剂饮片次之。消费的对象在历史上是属于豪门贵族，解

放后则是广大劳动群众以及国际友人。由于同仁堂的经营策略以货真价实药效保险取胜，故他家在二百七十年历史的沧桑变革中，总是持续发展，商业信誉逐渐提高，消费对象越来越多。

(2)刘是指菜市口西鹤年堂和大柵栏同济堂两家。西鹤年堂是刘一峰的独资。同济堂是马刘两家合资，经理刘汉臣掌管业务（刘一峰的族兄），这两家药店的经营策略是以汤剂饮片，胶醴药露门市营业为主，丸散膏丹虽也具备，但不努力提倡，可能是因为同仁堂药店的中成药已占主要市场。别家不好再创出高于同仁堂名牌的缘故。消费的对象历史上也是以豪门贵族为主，实则是中等生活水平的居民较多。在国药业中的门市零售汤剂饮片，这两家都在群众中树有信誉。

至于类似两家经营情况的，还有东四永安堂、地安门仁一堂。他们发展业务的策略是各守实力，配料认真，精心炮制，讲究实效，不扩张经营势力范周。业务的发展是稳定持久的。

(3)吴、王、柳三家：吴有崇外大街千芝堂，珠市口南山堂、阜成门琪卉堂。

王是崇外大街庆仁堂，珠市口南庆仁堂，虎坊桥西庆仁堂，东四北大街北庆仁堂，前门大街庆颐堂，阜成门大和堂。

柳是西直门大街圣济堂和同达堂。

这三家药店的经营情况基本相同，竞争的消费对象，除门市营业各异外，批发销售的业

务大同小异。他们也都是既争门市营业的发达也都竭尽全力，在批发业务上力争独自垄断市场的霸权。结果由于盲目竞争业务，缺乏远见，谁也未能称雄。

综上所述，北京市在敌伪时期，国药业的经营情况，从几大家的业务竞争上看，乐刘两家和吴王柳三家，以及其他各小户，矛盾较小。而吴王柳三家，在批发业务上的矛盾是势不两立，各不相让。充分体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竞争是唯利是图。

(三)日本投降后至解放前的国药业经营情况。

日本投降后，人民欢欣鼓舞，市场物价也暴跌，各行业的商品充满街头巷尾，和敌伪时期的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大不相同，可是到九月中旬，物价逐渐上涨，而且久涨不落，开始热烈欢庆的大众心情也日益变冷。在敌伪时期都没有发行的五千元票而的联合准备券也出台了，严重影响各行业的物价，虽然日本投降后仅三年，但却给国药业的发展造成了很多困难。

解放后，北京市的国药业得到了恢复，到了1957年的公私合营时期，在党的有关扶植工商业、繁荣经济、保障供给的政策指引下，批发业务，加工生产，逐渐好转，并得到发展。我也被国家安排在北京药材公司南城批发部，又开始了在新岗位上的工作。

